

当 代 著 名 翻 译 家 自 选 集

林洪亮
译文自选集

林洪亮 译编
漓江出版社



当代著名翻译家自选集

林洪亮

译文自选集

林洪亮 译编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洪亮译文自选集/林洪亮译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407-8395-2

I. ①林… II. ①林… III. ①林洪亮—译文—文集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波兰 IV. ①
I51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6371号

出版统筹:吴晓妮

责任编辑:周向荣

助理编辑:吕解颐

封面设计:李诗彤

出版人: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773-2583322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河北省三河市洵阳镇化甲屯小学东 邮政编码:065200)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19.25 字数:320千字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6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前言

我的译介生涯

1935年我出生在江西省南康县(现为赣州市南康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过着忍饥挨饿的日子,根本谈不上什么志愿理想,但上学念书却成了我最大的乐趣和愿望。其实就我的身世来说,在1949年前,即使想上中学都会遇到莫大的困难,根本没有继续深造的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的命运得到了巨大的改变,不仅家庭得到了翻身解放,而且连做梦也想不到的美好前程也为我敞开了。我得以念完中学,考上大学,而且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初的一批国家公派留学生,回国后又被分配到国家最高的研究机构工作。想不到一个农民的孩子竟也进入了高级知识分子的行列。在我们家乡的林氏宗族看来,这是穷人窝里出了个“翰林进士”,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喜事。虽然我生性愚鲁,不擅言辞,难以表达我的内心感情,但我始终没有忘记,是党和国家成就了我;我也始终怀着一颗对国家、对党的感恩图报之心。在学习期间,懂得如何勤奋学习;工作之后,虽经各种坎坷,依然怀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好未来贡献微薄之力的热忱,怀有为中国和波兰的人民友谊和文化交流尽一份力量的决心。尽管我现在已是耄耋之年,体力衰竭,但我仍在不断努力,以回馈国家的培养之恩。

我在六岁时便进了家后面不远的上坪岭小学。学校很简陋,四个年级的学生全在一间教室里上课。我每天天一亮便牵着黄牛到外面去放牧,同时念诵着所学的课文。那个时候全村人家都没有时钟,我们都是看天来计算时间,等到太阳到了一定的高度,便牵牛回家吃饭,饭后立即跑去上学。由于家庭穷苦,我青少年时期都是在“苦读书、读苦书”中度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这段苦读的经历我就不再赘述了,不过再苦我都坚持下来了,而且成绩还算可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很早就学会了挑水、做饭这一套家务活。随着年龄的增长,每逢星期天和寒暑假,我都会协助父母在农田劳动。到高中二年级时,农田的犁、耙、种、收全部技艺我可以说都掌握了,而且能独立操作,许多出身于农家的孩子,也很少像我那样能达到独立耕种的水平。1949年6月南康得到了解放,土

改时家里分到了田地,家境得到了改善,我在学校里还获得了助学金。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学习和各种社会活动中。1952年我加入了共青团,成为南康中学发展的第二批团员。从那时候起,我才有了自己的志向和理想。1949年后,我想当一名解放军,几次报名参加军校,都因身高和体重达不到要求而被拒收。后来我便立志要当一名地质工作者,一是因为我在中学时对地理课有一种天生的爱好,多年担任着地理课的课代表;二是我特别喜爱祖国的大好河山,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宝藏,而且那个时候搞地质工作也不像现在宣传的那样可怕,况且我从小就经历过种种艰难困苦,有一定吃苦耐劳的基础。但到了1952年上高中二年级时,那时我兼任南康新华书店的义务推销员,有一次取来的一批新书中有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便“近水楼台先得月”,开始好奇地读了起来。这一读不要紧,我立即便沉浸在书里,被保尔·柯察金感动得时而欢笑,时而悲伤,时而热血沸腾,时而泪流满脸。也就在那时,我的心里又萌生了另一个愿望和理想:要是能成为一个作家,能写出一部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能感动千万读者的作品,真是功莫大焉。于是1953年报考大学时,我在填写地质等专业之外还填报了中国语言文学系,虽然中文系并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但国内当时并没有培养作家的场所,而中文系是和作家行业最为接近的专业,所以我便报了它。考试的结果,我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录取,虽然不尽如我意,没有考上我特别想上的专业,但那时候只要能上大学,什么专业都可以,我都很乐意听从国家的分配。

1953年武汉大学中文系只招收了25个学生,在这些学生中,除了我之外,个个都是文学爱好者,他们从小就阅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而且有些同学在中学期间就发表了诗歌和小说,只有我是半路出家。在这之前,由于我成长的地方比较贫穷落后,县里连一间图书室都没有,那个时候我能读到的“文学作品”,只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和《罗通扫北》这一类流传于乡村的演义小说,至于现当代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毫无接触。幸好武汉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而且授课的是刘绶松老师,他讲课条理分明,严谨而又生动,很得学生们喜欢。我和同学们相处,深知自己的基础较差,必须加倍努力才能赶上,从这时候起我便特别注意中文水平和文学知识的提高。1954年春,我被学校推荐,参加了中南区的留学生的统考。1954年6月初,接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通知:武汉大学有五名同学被选派到东欧国家去留学,其中四人是我们的,我是其中之一,并由我带队前往北京报到。三天后我们便告别了正在紧张防汛的同学和我们已经喜欢上了的武汉大学。在北京俄语学院经过两个多月

的培训,我被分配到波兰学习。1954年8月底,被分配到波兰留学的十七名同学,带着国家发给我们的两箱衣物和教育部领导对我们的殷切希望和谆谆嘱咐,踏上了开往华沙的列车。经过莫斯科的转车和十多天的长途旅程,我们兴高采烈地到达了华沙,受到了波兰共青团和其他青年学生组织的热情欢迎。

在到达波兰之前,我对波兰的了解可以说是非常肤浅,仅从世界地理课和历史课上知道有这么一个备受外国欺凌的东欧国家。至于波兰文学的知识,也只是从鲁迅的文章中读到过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和显克维奇这几位作家的名字,而且当时读过也就过去了,并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殊料后来的命运竟让我和这些作家结缘一世、相处一生了。

起初我是被教育部分配到波兰去学外交的,但由于我是客家人,从小都没有出过远门,我的地方口音很重,不适合做口译人才,而外交用的主要是口译,于是我便回到了语言文学这个熟悉一些的专业,而且抱定将来只搞笔耕的工作。到了波兰之后,你就会体验到浓厚的文学氛围,会切身感受到波兰人民对他们的作家的尊敬和爱戴。以作家命名的街道和作家的塑像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几乎每个城市都有,特别是坐落在华沙克拉科夫城郊大街中段的那座高大雄伟的密茨凯维奇雕像,它和华沙大学在一条街上,每次上下学都要经过它的旁边,而在它的不远处就是波兰著名作家普鲁斯的雕像,仰望着他们我的心中都会涌起无限的崇敬。

经过一年的波兰语言学习之后,我便进入了华沙大学的波兰语言文学系学习。我们和波兰同学同吃同住同学习,是正规的五年学制。20世纪50年代波兰的教学体制和方法同我们国内的有不小的区别。老师讲课没有讲稿,学生只好在下面边听边记笔记。每学年开始时,教文学史的老师会给每一位学生发下一份必读书目,这份书单涵盖了这一学年所涉及的全部作家和他们的主要作品。第一年学的是波兰古代文学史,波兰古今文字虽不及中国古今文字的差别那样大,但也有所不同,所以学习很困难。但我们几个中国同学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再加上波兰同学的热情相助,我们都很顺利地渡过了这个难关。

1955年,除了正式进入华沙大学学习外,还有两件事值得我铭记在心:一是这年的夏天在华沙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这个联欢节上云集了世界各国的青年,让我见到许多从未见到的人和事,开拓了我的眼界。与此同时,在这种巨型活动的感召下,我写了几篇有关华沙和联欢节的散文(或报道),向《光明日报》投稿后,不仅立即登出,报社还邀我继续为他们写稿。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发

表自己写的东西,像许多初次发表作品的人一样心里很是很高兴,可是我的这种“自由主义”行为却受到了留学生管理员的严厉批评,吓得我拒绝了报社的约稿,从此有两年多再也不敢写稿了。二是195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波兰伟大诗人密茨凯维奇定为世界文化名人,这一年也被定为密茨凯维奇年。世界各国都纷纷举行纪念活动,中国也不例外。1955年秋,中国文艺界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大会,郭沫若、茅盾、孙用、戈宝权、孙绳武等一批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参加了这次大会。《文艺报》和《世界文学》都相继发表了评介文章和由孙玮(即孙绳武)根据俄文翻译的密茨凯维奇的诗歌。我虽身处国外,但对国内的这些活动依然十分关心,除了从使馆借来有关报刊仔细阅读外,还把孙译的诗篇抄在我的笔记本上。

通过第一年对波兰古代文学史(从中世纪到18世纪)的学习,我了解到波兰文学的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其诗歌的成就不亚于意、法等国。第二年学的是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文学,发下的书单比第一年几乎多了一倍。波兰浪漫主义时期是波兰诗歌创作最辉煌的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富有才华的诗人。这批诗人大都出生于经历三次瓜分而灭亡之后的波兰,是“一出娘胎就受着奴役的煎熬,在襁褓之中就被人钉上了锁链”的一代人。但是他们不堪外国的统治,不甘心做亡国奴,他们渴望自由,追求解放,他们的诗歌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悲愤情。而密茨凯维奇则是波兰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创者和主将,也是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精神领袖,波兰人民尊称他为“诗圣”“先知”。读他的诗往往让我心潮澎湃,激起我的强烈共鸣。在这一学年中,我读了他的全部诗歌作品和一些政论文章,同时开始收集密氏作品的各种版本和有关他的评论著作。恰逢此时我在华沙新世界街的旧书店里偶然看到一部密茨凯维奇的十六卷全集,便将它买了下来,当时心里的欣喜劲儿就不言自明了。1956年我在国内的报刊上读到出版密茨凯维奇的长诗《塔杜施先生》和《密茨凯维奇诗选》的广告,便托国内的朋友替我购买这两本书,《塔杜施先生》不久便买着了,但《诗选》却一直没有买到,朋友猜测可能还没有出版。到了1957年,心急的我便鲁莽地给该书的主译孙用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简单介绍我自己外,主要是询问诗选的出版情况。由于我不认识孙老先生,只好把信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过了两个月,我竟收到了孙老先生的回信,真让我喜出望外。他在信中告知,由于当时的一些客观原因,诗选尚未出版,而且他非常谦和地表示,愿和我这个小辈交往。1957年暑假,我获准回国探亲,应约前去拜访了孙老前辈,他特别热情地

接待了我。他身材修长,平易近人,气质儒雅,毫无大翻译家的架子。我向他表达了我对他的尊敬,以及我对密茨凯维奇和波兰文学的喜爱,期望自己将来能做一些译介工作,更希望能得到他的指教和帮助。回华沙之前我又应约去拜访了他一次,这次他要我回华沙之后,尽快译出几首密氏的诗来,好让他插进诗选去。我听了之后既高兴又惶恐不安,高兴的是有幸能得到孙老的提携、指导和帮助,不安的是我才疏学浅,深怕有负孙老对我的期望,但他很热情地鼓励了我。回到华沙之后我一边上课学习,一边挤出时间来翻译密氏的诗歌,经过一番努力,我终于译出了《希维特什》《青年和姑娘》《歌》和《犹疑》四首诗,蒙孙老润色收进了诗选,令我特别欣喜。因为这四首诗虽然体量不大,却是直接从波兰原文译成中文的第一批作品,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但我译诗的这种行为却被认作是名利思想的表现,又一次受到留学生管理员的批评。

第三学年学的是19世纪下半叶的波兰现实主义文学,这是波兰小说创作大繁荣的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和闪耀着民主思想光辉的作品。发下的书单虽和浪漫主义时期的数量差不多,但每个作家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鸿幅巨制,每部小说的分量都大大超过了诗集。为了记住这些作品我把读过的每章内容提要都写在笔记本上,这样的笔记本这一年就记了十几本。我当时特别欣赏显克维奇的《你往何处去》《十字军骑士》和普鲁斯的《玩偶》,曾暗下决心将来要把它们翻译成中文。

大学学完三年之后,便转入硕士两年的学习,学生可以根据各自的志愿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时期和指导老师。我选择了浪漫主义时期,指导老师是波兰著名的浪漫主义时期研究学者E.Sawrymowicz教授,本来我是想研究密茨凯维奇的,但我的老师认为,有关密茨凯维奇的论著已经写得很多了,研究的空间很小,于是他指定斯沃瓦茨基为我的研究对象,并给我拟定了论文题目。这两年除了听导师的课程,我还选修了其他有关科目。1959年是斯沃瓦茨基诞生150周年,波兰学术界将举行大型国际会议来纪念这位波兰浪漫派的第二大诗人。当时斯沃瓦茨基还不为中国人所知晓,其作品也尚未介绍到中国来,我便想译介他的一些诗歌。我的这一想法得到孙用老先生的赞同和支持,我便利用1958年暑假和1959年寒假,偷偷地译出了斯沃瓦茨基的二十多首短诗和三首长诗,得到孙老的编辑加工之后,决定在波兰的国际会议之前出版。孙用先生把已经编好的译稿于1959年6月初寄给我,要我审阅一遍后尽快寄回给出版社。但此时正逢我期末考试,有好几门功课要考,无法分暇去阅读译稿,等我将译稿寄回人民

文学出版社时已是7月中旬了,出版社告知,来不及在9月前出版,只好等以后的机会。这一拖便是几十年,连我自己都忘记了,最近才从旧纸箱中找出,有些稿纸还被老鼠咬坏了,看来是我住东四头条平房时留下的后果。1960年6月我的硕士论文顺利通过了,并获得了硕士学位和毕业证书。在等待集体回国期间我还把波兰著名剧作家克鲁奇科夫斯基的新作《自由的第一天》译了出来,当时这出剧在波兰十多个城市的剧院同时演出,轰动一时。我把译稿寄给《世界文学》后,由于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刊物不久便暂时停刊了,后来我对译稿也无暇关注,最后不知所终了。

1960年7月初回国后,我们在当时的北京俄语学院集中学习四个月,直到11月才分配工作,我很荣幸地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苏联东欧文学组,组长是戈宝权,副组长是叶水夫。我到文学所后,先是学习《毛泽东选集》一个月,接着被派到锅炉房去烧火供暖。到了1961年4月,我又被派到河北涿县的张八屯去贯彻“二十三条”,也就是“整社运动”。也就是在这里,我才见到我仰慕已久的戈宝权同志,他也是刚从中苏友协调到文学所,随即便被派往张八屯任工作组组长。初次相见,他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平易近人,知识渊博,经历丰富,嗣后几十年来我都是在他的领导下和他一起工作,得益匪浅。“整社”回来后,我们苏东组便分成了两个组:苏联文学组和东欧文学组,东欧组组长便是戈宝权,组员全都是刚从东欧波、捷、匈、保、罗等国回来的留学生。这些组员都是在所在国进行了正规的四年或五年的学习,有着较为深厚的业务知识,但对于研究工作则是门外汉。于是头一两年大家都制订了个人进修计划,按照所长何其芳订立的一百多种书单进行阅读学习,书单包括中外文学经典作品、文学理论和文学论著。1962年至1963年上半年的一年半是我回国后比较安定的时期,这期间,我认真阅读了书单中的作品,获益不小。与此同时,我还应约翻译了波兰哲学家沙夫的《人的哲学》中的一部分,以及有关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资料,后被收进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内部资料汇编中。1963年我又选译了一组波兰文学评论的文章,其中有密茨凯维奇的《论浪漫主义诗歌》和奥热什科娃、普鲁斯写的文章摘选,刊登在《古典文艺理论》1964年第四辑上。回国后,我继续得到孙用老前辈的指导和帮助,他曾和我约定,一道翻译密茨凯维奇的《塔杜施先生》,因为他觉得他原来的译本是散文体,不免有所欠缺,还是译成韵文体好,于是他要我先根据波兰原文译出初稿,再由他和我一起商量修改定稿。后来我只译出长诗的半部草稿,便因种种原因而搁置了下来,未能在孙老生前完成他

的愿望,实是抱憾。从1963年的秋冬起,我参加了通县西田阳公社的“四清”工作。1964年9月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我们所有从事外国文学工作的人员也从文学研究所转到了外文所,所长是著名的德语文学学者冯至教授。外文所一成立便把全所的百分之九十的员工都拉到安徽寿县去搞“四清”了,我和文美惠都在内。1965年从安徽“四清”回来不久,又让我们东欧组的大部分组员(除了在山东劳动锻炼的以外)到延庆康庄的榆林堡去“滚一身泥巴”,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才把我们撤了回来。随后便是十年“文革”。这十多年来不仅不能从事业务工作,就是连看外文书都受到限制和禁止。幸好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我利用间隙回京的短暂时间,尽可能地阅读了已译成中文的所有能找得到的波兰文学作品,从中不仅了解到波兰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而且也能向前辈学习到一些翻译经验和技巧。同时我也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中文水平的欠缺,见缝插针地读了一些中国文学的优秀作品。196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要我替他们正待出版的显克维奇《十字军骑士》根据波兰原文进行一番校阅。这部小说是陈冠商先生从英文转译的,比起以前所译的波兰文学作品来,陈译的这部小说不仅更加真实可信,文笔也更加流畅。我与其说是在校阅,还不如说是在学习,从中领会到了许多翻译的方法、技巧和文字的运用,初步明了了自己应如何去翻译小说,这对以后的翻译工作大有裨益。

“文化大革命”中,一切业务工作均被禁止,连看看外文书都会受到批判,但是自己又不甘心放弃,总是“贼心”不死想做点什么,于是我便想,公开做不行,那就偷偷摸摸地趁晚上回家之后做点翻译。为了掩人耳目,我把白纸裁成三寸宽的小纸条,装订成小本子,每本都不厚,随时都可以藏起来。考虑到密茨凯维奇的《先人祭》还没有人翻译,于是经过几年暗中努力,我竟把它的第二、三、四部都译出了草稿。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易丽君翻译的《先人祭》第三部,虽是内部发行,但总算出来了,我为之高兴。看到有了她的译书,我便将我的译稿束之高阁了。到了1999年浙江文艺出版社要出一套二十卷的《世界经典戏剧全集》,主编童道明要我编选其中的东欧卷,我便选了东欧国家的六个剧本,摆在前位的便是密茨凯维奇的《先人祭》。因为这套书出版时间很紧,要尽量采用已有的译本,我便选用易丽君译的第三部,得知她还译出了第四部,我又请她把稿子给我。由于她没有译第二部,我便把我原先译出的第二部草稿找了出来,加以修改整理,才使《先人祭》有了个较为完整的译本。

1968年工军宣队进驻学部,大家都集中住在所里搞“斗批改”,我也被当成

“五一六”分子隔离审查批斗了两个多月。1969年我们被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去劳动,这一大段时间就再也无法去搞业务了。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才开始恢复业务工作。由于东欧室的同志大多从东欧各国留学回来,对该国的文学和社会知识都有较深的了解,但回国十多年来都几乎没有从事过业务研究工作,为了能提高这一批人的研究能力,所领导便想通过一项集体科目让大家都能得到提高。于是冯至所长、王平凡党组书记和戈宝权同志带领兴万生和我多次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和孙绳武、蒋路同志商讨开展工作的问題,决定集体编写一部《东欧文学史》。作为一部地区性的外国文学史,不仅我们国内没有过,就连欧美这些西方国家也没有写过,因此要写起来自然是困难重重。然而大家被压抑多年的工作激情终于爆发出来了,我们都有一股敢于攀登科学高峰的决心和信心。东欧可以说是个政治概念,当时是指除苏联和东德外欧洲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但这些国家的民族、历史和社会发展都不尽相同,要把它们捏在一起,的确很不容易。经过多次的讨论,我们决定以反封建和经受外族压迫这两条主线为切入点,让这些国家的文学发展都贯通起来。随后由我起草了一份编写体例,大家通过后便立即投入到工作中去了。业务一经开展,各种任务便纷至沓来,这个时期还要参与撰稿的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戏剧卷》《外国文学家大辞典》《外国文学作品提要》等大型工具书。与此同时,1977年底,上海文艺出版社金子信同志要编选出版一套三卷本的《外国短篇小说》,约我翻译显克维奇的《音乐迷杨科》,这是我翻译的第一篇显克维奇的小说,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并被多种文集收入出版。1978年初,我应上海《文艺论丛》之约,撰写了《鲁迅与密茨凯维奇》《论显克维奇和他的〈十字军骑士〉》,分别发表在《文艺论丛》1978年的第二辑和第五辑上。这是我发表的第一批学术论文。

1978年底,金子信同志又在策划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丛书的翻译出版工作,多次到我家同我和文美惠商谈有关选题的问题,并商定把显克维奇的《你往何处去》和吉卜林的短篇小说列为丛书第一辑最先出版。接受合约后,我便积极投入到译书的准备工作。《你往何处去》在波兰被称为最著名的一部经典小说,它以古罗马皇帝尼禄迫害早期基督教徒为背景,通过罗马青年将领维尼兹尤斯和信奉基督教的少女莉吉亚之间真挚、曲折、缠绵、痛苦的爱情故事,真实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习俗,深刻揭示了暴君尼禄的荒淫残暴和对基督教徒的残酷迫害,生动描写了仁人志士和教徒们的不屈斗争,出版后在欧美各国引起强烈的反响,被誉为“真正的基督教史诗”。要翻译这样一部史诗式的长篇小说

(50多万字),对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人来说,自然会有不少的困难。我只好笨人用笨办法去解决,除了反复阅读原作外,还对小说所描写的历史背景进行了一番学习和研究。为了寻找这方面的材料,我还多次到东安市场旧书店去查找和购买有关基督教和古罗马历史方面的书籍。此外,我还阅读了波兰一些有关这部小说的评论文字,经过这些努力,我的心里才有了一定的底气,翻译起来尚能得心应手。1980年初交稿之后,因文艺和译文两个出版社之间的出版范围之争,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应归译文出版社,文艺出版社便不能再出版诺贝尔文学奖这套丛书了。不久之后这套丛书便由漓江出版社的刘硕良同志接过去了。但《你往何处去》还是被上海文艺出版社留下,直到1982年年底才出版。小说出版后受到各界的欢迎和好评,到目前为止,已经再版了七版,每版还加印了好多次,总计已出版几十万册,这在东欧文学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本书还给我带来不小的荣誉:先是1984年波兰文化部给我颁发了“波兰文化功勋奖章”,继而是波兰总统和波兰教会的最高领导都分别接见或会见了,感谢我所做出的贡献。

在外国文学所,文学翻译是不算工作成绩的,不能列入评审职称的条件,文学研究、撰写论文和论著才是我们的主要工作。1982年戈宝权同志离休,兴万生同志也因健康原因不再任职,改由冯植生同志和我任正副主任。《东欧文学史》在大家的努力下,于1984年完成了初稿,并于该年年中在香山避暑山庄召开了一次审稿讨论会,这是我国东欧文学界举行的一次空前的盛会,参加此次会议的除了老一辈的戈宝权、叶水夫和孙绳武、蒋路等人,还有当时所有从事东欧文学研究、教学和翻译的人。大家在肯定初稿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我们更加充满了信心,经过全组同志们的讨论和修改,终于在1987年完成了这部论著。

在撰写和修改《东欧文学史》期间,我又开展了我个人的研究项目:密茨凯维奇评传。为了写好这部著作,我阅读了密茨凯维奇的全部著作和有关他的各种论著,而且在写作过程当中,我还翻译了他的一些诗作,主要是供引文用。1985年到1995年我退休前的十年,是我工作最紧张最忙碌的时期,1985年起我担任东欧文学室的主任,在这期间我特别想扩大东欧文学在中国的影响,能使更多的中国读者增加对东欧文学的兴趣和了解,为此我积极参与东欧文学作品的编选工作,先后参与编选的文集有《东欧文学丛书》(十四种,重庆出版社)、《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东欧五卷,重庆出版社,我是总编委和东欧分系的主编)

和其他多种选集。与此同时,我们还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联合举行了三次现代东欧文学讨论会。90年代我还多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小语种文学翻译研究人才后继乏人的问题,呼吁有关方面的重视。1998年是波兰伟大的爱国诗人密茨凯维奇诞辰二百周年,我们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联合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大会和学术讨论会,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还出版了由易丽君和我合译的密茨凯维奇的万行长诗《塔杜施先生》。1990年我撰写的专著《密茨凯维奇》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这是由中国学者写的第一部有关波兰作家的论著。在这期间,我还应邀参与了《东欧戏剧史》波兰戏剧部分的撰稿工作,在此基础上我又完成了《波兰戏剧简史》这部著作(1995年出版)。

由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丛书已转到漓江出版社,而原先商定的《你往何处去》又被上海文艺出版社留下,只好重新再定要译的作品。经与刘硕良商定,我选译了显克维奇的十个中短篇小说,1986年底出版时书名为《第三个女人》。作为东欧文学工作者,我个人认为,翻译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方面。在中国,东欧文学并不那么为人所知晓,它不像其他大语种的文学作品那样早就翻译过来了,而且还有专门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才。东欧文学不一样,由于过去懂得东欧国家文字的人很少,东欧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也就寥寥无几,而且全都是从别种文字转译过来的。我认为,作为第一批派出去学习东欧国家文字的文化工作者,既要会研究,写出论文和论著来,也应会翻译文学作品。没有文学作品的翻译,广大读者就无法了解该国的文学,论著写得再好也等于在放空炮。所以我是主张搞东欧文学的人既要会研究、会写论文和专著,又要能翻译文学作品,而且因为人少,小说、诗歌、散文、剧本,你都要学着去做。东欧国家里的人虽然也会称赞你的研究成果,但他们更看重你的翻译,我去波兰访问时常常会遇到波兰人问我:你翻译了什么作品,很少有人问我写了什么有关波兰文学的论著,即使那个询问我的人知道我是社会科学院搞研究工作的。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波兰科学院签订了科学协定,正式恢复了两国的交流合作,我是第一个被派到波兰访问的人。从1960年毕业回国之后,相隔27年才回去波兰访问,我的那些波兰朋友见到我都喜出望外。由于音信隔断,他们都特别担心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1994年我再次访问波兰,深切感受到波兰学术界在我毕业离开之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单是波兰文学史著作就有厚厚两大套,每套都是多卷本。每次访问都获益匪浅,收集到了许多材料。访

波期间,华沙文化中心还专门为我举行了一次“作家晚会”,会上除了介绍我的经历和翻译成果之外,还用中、波文朗诵了我译的波兰文学作品,最后是合唱团的演唱,盛况可谓空前。为中国译者举行这样的晚会在波兰还是第一次。

我主编的《东欧当代文学史》1998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随后我便着手撰写《显克维奇——卓尔不群的历史小说大师》这部著作,1999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后来我还应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邀约翻译了显克维奇的另一部著名长篇历史小说《十字军骑士》(约70万字),2000年出版,2002年再版。2008年南海出版公司拿去出版,五年之内加印了八次,印数达五万多册。201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八卷本《显克维奇选集》时将此书收为第八卷,今年他们又将出它的单行本。

1995年底退休之后,我依然笔耕不辍。1996年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应邀为多家刊物翻译了她的诗歌和短文,并撰写了多篇评介她的文章。2000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由我翻译的辛波斯卡的诗文集《呼唤雪人》,收有她的几乎全部的诗歌和四十篇短文。1997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显克维奇的《灯塔看守》,内收六个中短篇,其中三篇为旧译,三篇为新译。200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选出显克维奇的七篇中短篇小说,以《哈尼娅》为书名出版。201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八卷本的《显克维奇选集》时,又把我翻译的全部十五篇中短篇小说收入其中的第一卷。

2000年我获得了波兰总统颁发的“十字骑士勋章”,并于次年年初受邀访问波兰两周。2000年应译林出版社之约,翻译显克维奇的《火与剑》(约80万字),这是显克维奇由中短篇小说转向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部历史小说,于2005年出版,2014年又得到漓江出版社的再版。这期间我还编选了《世界戏剧经典全集》东欧卷、《东欧国家经典散文》和《戈宝权纪念文集》。2005年、2009年和2013年我受波兰书院的邀请,先后参加了四年一届的第一、二、三届的“波兰文学翻译家国际会议”。译完《火与剑》之后,我便暂停和出版社的约稿,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我非常喜欢的波兰音乐家肖邦的研究和写作之中。在留学之前,我对肖邦一无所知,踏上波兰国土之后常常听到的便是肖邦的乐曲声,耳濡目染便逐渐喜欢上了这位波兰伟大的音乐家。“文化大革命”后,我在研究密茨凯维奇的时候也涉及了肖邦,因为他们同是波兰浪漫派,到了巴黎后他们又是志趣相投的好友。我除了阅读有关他的书籍,还采购了当时国内发行的许多磁带和光碟。访问波兰时我的波兰朋友还送给我一套鲁宾斯坦演奏的肖邦全集的光碟,我自己

还多次到书店去收集有关肖邦的著作。有些国内外的著作把肖邦写成一个多愁善感、优柔寡断、意志薄弱、孤傲离群、政治不坚定的人,但我读了一些材料之后感到肖邦完全相反,是个最富于同情心、思想意志最坚定的爱国音乐家,于是我想为他正名。但是我不懂音乐,无法评价他的音乐,幸好这时我得到我的好友于润洋教授的鼎力相助。他也是我留学波兰的同学,是国内独一无二的肖邦专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我们曾经约定:他写一本评论肖邦音乐的著作,我写肖邦的生平。他还把他的藏书毫无保留地借给我使用,特别是那部50年代初波兰出版的《肖邦通信集》给了我莫大的帮助,使我写的《肖邦传》有据可依、忠实可信,同时也使我得以选译出了一本中文版的《肖邦通信集》。这两本书于2010年肖邦诞生二百周年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上海世博会期间还成了波兰方赠送宾客的礼物,同年我还得到波兰文化和世遗部颁发的“荣誉艺术—波兰文化银质勋章”。2013年我应上海九久读书人出版公司之邀,翻译了波兰荒诞派著名作家贡布罗维奇的小说《着魔》,2014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15年由我和易丽君、张振辉三人合译的密茨凯维奇的《先人祭》(全译本)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2016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我译的显克维奇特为青少年写作的长篇小说《中非历险记》,而我积几十年翻译历程才完成的《密茨凯维奇诗选》也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米沃什诗集》(四卷本)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年底或明年初出版,其中前两卷由我翻译。现在仍有几项任务等待我去完成,虽然我已盖耄耋之年,年老体衰,常有力不从心之感,但只要我还一息尚存,我就不会停止工作,因为我把译介波兰文学视为我的一种崇高的使命和职责,我也想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来回报国家对我的培养,来感谢波兰对我多年的教育,用我的微薄之力为中波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友谊做出一点贡献。

本书得以编辑出版,首先应感谢漓江出版社和吴晓妮副总编的大力支持。

本选集分三部分,一是小说,二是散文,三是诗歌。小说只选了我翻译的三位波兰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都能代表他们各自的创作特色。其实我的翻译业绩主要是长篇小说,但我觉得即使选取其中最优美的片段,也不足以显示它的全貌和真正价值,所以只好舍去不选。散文方面虽然我编选过几本东欧国家的散文集,但其中我翻译的并不多。这里只选了波兰五位作家的七篇作品,以供读者赏鉴。诗歌是很难翻译的,由于国内从事波兰文学译介的人很少,而诗歌

又常常受到读者的垂青,出版社来邀请你,你不好拒绝,只好勉为其难,每次翻译都有如履薄冰之感。这里选出的诗人是波兰最著名的、最具有影响力的三大诗人。前两位是波兰浪漫派的主将和爱国诗人,后一位是20世纪9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另外我还选了三位革命诗人的作品,它们代表着波兰不同时期的革命斗争内容,希望能给读者一些奋发向上的感悟和激励。

选辑、译文如有不当处,请不吝赐正。

目 录

第一卷 小说

亚·希温托霍夫斯基

003 哈娃·鲁宾

亨利克·显克维奇

021 音乐迷杨科

028 灯塔看守

043 胜利者巴尔特克

093 酋 长

100 第三个女人

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

150 腾 飞——献给阿·加缪

第二卷 散文

亚当·密茨凯维奇

185 我们的纲领

189 普希金与俄罗斯文学运动